

引言：对《狱中札记》的历时性解读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

1948~1951年，意大利艾纳乌迪出版社按照以下顺序出版了《狱中札记》：《历史唯物主义与贝内德托·克罗齐^①的哲学》（1948），《知识分子与文化的组织》（1949），《民族复兴运动》（1949），《论马基雅维利、政治学和现代国家》（1949），《文学与民族生活》（1950），《过去与现在》（1951）。这些写于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札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流传时，政治、文化形势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法西斯主义已经垮台，一个新的政治阶级已在管理着意大利。葛兰西的这些札记是在克罗齐和詹蒂莱^②的年代写就的，但人们在读到它们的时候，詹蒂莱已经去世，克罗齐主义也已日薄西山。葛兰西是在他自己苦心构建的思索得到传播之后才广为人知的。

葛兰西 1926 年 11 月 8 日被逮捕，1937 年 4 月 27 日去世。次年，即 1938 年，由鲁杰罗·格里埃科^③和帕尔米罗·陶里亚

① 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美学》、《精神哲学》等著作。——译注

② 詹蒂莱·乔万尼（Gentile Giovanni，1875~1944），意大利哲学家，早年倡导唯心主义，并且是克罗齐的朋友，后来鼓吹法西斯主义。——译注

③ 鲁杰罗·格里埃科（Ruggero Grieco，1893~1955），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意共书记、驻共产国际代表。——译注

蒂 在巴黎主编出版了《纪念葛兰西》（*Scritti in onore di Gramsci*）一书。格里埃科认为，葛兰西“首先是党的领导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是一位布尔什维克，是使阶级斗争的三条战线，即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这三条战线重新统一起来的意大利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见该书第 10 页）。在陶里亚蒂看来，葛兰西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一位意大利布尔什维克”，陶里亚蒂与格里埃科一致认为，“斯大林的著作对他（葛兰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深知，“在一个集中化的共产党内，惟一重要的是遵守上级的命令。”（见该书第 51 页）

在《狱中札记》于 1948~1951 年先后出版之后，意大利共产党便把葛兰西宣传为自己理论学说的基准点，因为正如共产党报章中所说的那样，“1940~1945 年战争之后意大利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所有根本性问题，葛兰西在其札记中都已作过论述”。但是，按专题出版的《狱中札记》的这些版本，从文献学和历史分析的角度反映出葛兰西的政治思考了吗？

弗朗卡·帕芭最近发表了一篇观点十分尖锐的题为《战后至 80 年代的意大利葛兰西主义》^② 的论文，并把“陶里亚蒂的葛兰西”与“陶里亚蒂之后的葛兰西”作出了区分。弗朗卡·帕芭的这一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应该摆脱从党派角度解读葛兰西，力求从中看到某种意识形态连续性的那样一种观点。

陶里亚蒂从 1945 年发表第一篇（论葛兰西）起，就一直坚持认为葛兰西思想具有理论上的自主性，而且从这一前提出发，他还提出了欧洲民主与自由是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发展到韦伯和克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 1893~1964*），国际共运著名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史人之一，葛兰西被捕入狱后，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译注

② 该论文收于 S. 马斯泰罗内主编的《欧洲政治思想：1945~1989》一书中，该书 1994 年由佛罗伦萨托斯卡纳出版中心出版。

罗齐的发展论点，并提出意大利南、北方人民群众获得“公民权”的问题。^①帕芭强调指出，如果说陶里亚蒂经常反复论及葛兰西所谈到的欧洲世俗信仰的主题的话，那么“在 1956～1957 年之间，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等一系列事件则清楚地显示出意大利葛兰西主义方针的丰富性”。1957 年，陶里亚蒂撰写了《安东尼奥·葛兰西思想及行为的现实性》一文，目的是重申，由于葛兰西的功绩，在意大利不存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究式解释的危险，意大利的葛兰西主义是一种反教条主义的文化，是欧洲人道主义传统主干上的一个分支，因为它不把公共利益同某一社会阶层的利益混为一谈。因此，“葛兰西的思想是为了寻找按照本国形势给定的方式和方法解决全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

帕芭认为，1964 年陶里亚蒂去世之后，人们对葛兰西思想的阐释发生了变化，因为意大利政治社会力量为实现意大利社会发展而提出的方案出现了变化。事实上，在 1964 年以后，欧洲左翼力量的政治文化取向已不同于以往，并出现了对苏联的批评性态度。

从解放直至去世，陶里亚蒂在社会经济层面上从未放弃对于资本主义和上层资产阶级的论战，而且在外交政策方面也一直反对帝国主义和北约。对于莫斯科，陶里亚蒂虽然要求得到文化和政治上的更多自主权，但苏联在他眼中则一直是十月革命创造的典范，尽管这一典范需要适应各国的特殊情况。实质上，陶里亚蒂对葛兰西思想的阐释一直是一种政治性阐述，目的是使意大利共产党的纲领具有理论上的依据。

1964～1968 年，即从陶里亚蒂去世到布拉格之春，是东欧

^① 见陶里亚蒂的《安东尼奥·葛兰西》一书，该书由 E. 拉焦尼埃里主编，1972 年由罗马联合出版社出版。

的戏剧性年代。因为一方面出现了“苏联模式的危机”，另一方面出现了“新进程”的必要性。不仅苏联共产党的官僚政权受到质疑，而且在苏联军队干预布拉格之后，许多人对莫斯科政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属性所抱有的幻想也随之破灭了。

东欧的事件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墨守成规，促使人们以更少的“正统”眼光来重新解读葛兰西的政治思想。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的气氛中，1967年4月23~27日在意大利卡里亚里市举行了葛兰西研究学术讨论会，会议的文件汇编于1969年10月出版。^①

在研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诺尔贝尔托·博比奥在谈及《狱中札记》时期的葛兰西时指出，“葛兰西是在分析社会时使用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博比奥认为，在葛兰西看来，由于国家“作为特殊利益的代表注定要随着社会的改造而走向消亡，因此必须从市民社会出发”。另外，葛兰西的理论“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引入了一种深刻的革新，因为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不属于经济基础的层面，而属于上层建筑的层面，也就是说它包含着整个意识形态和文化关系，因此他也就不同于马克思，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积极、活跃的层面是经济基础”。实际上，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不是来自于马克思而是来自黑格尔”。博比奥对葛兰西“从社会到国家，再从国家到社会”的理论线索的解读，为估价葛兰西思想的现代性开辟了新的前景。博比奥认为，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并没有把国家设想成一个强制性机关，而是设想成一个理性社会的产物。在这种社会中，人可以过一种合乎理性的、也就是合乎其自然的生活。

关于葛兰西思想中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是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和德国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的时候进行的。萨特当时已经转而

① 即《葛兰西与当代文化》。意大利联合出版社，1969。

关注古巴革命并支持法国议会左翼团体的立场。阿尔都塞继续批判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已退化为一种以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反对资产阶级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战。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性言论（见《否定的辩证法》，1966）无疑既涉及“资产阶级社会”也涉及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制度，但是这种反对教条主义的方针看来并没有指出新的道路。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技术社会、自由主义学说、公共舆论、政治参与以及广而言之，对于西方社会的种种批判并未包含什么明确的政治建议。

认为市民社会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具有根本性意义，这意味着认为对不尊重人权并对华约国家强加沉重霸权的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自由批评是正当的。国际形势要求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确定欧洲各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倡导与苏联共产党建立不同既往的新关系的，似乎正是拥有葛兰西思想的意大利共产党。我们不会忘记，在苏联共产党 1971 年于莫斯科举行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恩里科·贝林格曾要求每个共产党有权实行与苏联共产党不同的、独立的政治路线。1972 年 3 月，“葛兰西主义的”贝林格成为意共的总书记。若干年之后，人们在《大不列颠大百科全书》中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述”是“由贝林格确定的”。

不再按专题而是按年月顺序编辑出版的《狱中札记》全集，为葛兰西研究提供了便利。陶里亚蒂去世后，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对葛兰西的这些手稿进行编辑，以便出版一种评注性版本的需要日益迫切。人们已经无法在对葛兰西的各种概念没有把握的准确定义的情况下、在没有对这一长期思索的各个阶级进行考

① 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1922～1984），意大利著名政治家，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译注

证、准确确定其时间的情况下继续对葛兰西的各种术语进行辩论了。人们当时还担心，过去出版的札记可能出于政治原因而按照陶里亚蒂的意愿在文字上做了手脚。1975年，由瓦伦蒂诺·杰拉塔纳主编的《狱中札记》评注本终于出版了。某些葛兰西思想的研究者感到，从札记评注本来看，葛兰西好像有了不同以往的形象。人们一致认为，在《狱中札记》的第一个版本中，有关波尔迪加、^①托洛茨基，以及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经验的那些论述都被删除了，当时认为作者过分明显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段落也被重新修改了。在陶里亚蒂看来，葛兰西是意大利左翼历史主义传统（从戴·桑克蒂斯、拉布里奥拉到葛兰西）的终点，是克罗齐唯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替代物。

但是，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不认为在葛兰西那里确实存在什么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克里斯蒂娜·比西－格鲁克斯曼在《葛兰西与国家》（《Gramsci et l'Etat》，1975年巴黎出版）一书中对国家进行了辩护，认为它是使市民社会适应经济结构的工具。关于国家职能扩大的问题，比西－格鲁克斯曼否定了博比奥的论点，并指出，葛兰西在狱中的思索中，是把国家职能的扩大问题置于十分明确的论战性的理论框架之内的，是与有关马基雅维利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葛兰西对每一种确认国家具有司法强制性特性的定义都提出了置疑”，“国家的扩大是通过把领导权（Egemonia）及其机关并入自身而完成的，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通过强制，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而发挥职能。”^②意大利共产党也不太喜欢站在市民社会一边来坚决否定国家的职能，它认

① 阿马德奥·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1889～1970），意大利共产党创史人之一，该党第一任总书记。——译注

② 克里斯蒂娜·比西－格鲁克斯曼：《葛兰西与国家》，第89～90页，法雅尔出版社，巴黎，1975。

为毕竟应该是国家来确保社会中的社会平等。

应该提到的是，意共党员对国家职能的维护是出于对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的论战，天主教民主党当时在与其它政党寻求协议及作出内政选择时当然不是依据国家的总体利益。意大利共产党当时要求捍卫劳动阶级的利益，而社会党则日益被政党之间联手瓜分权力的做法所吸引。

在 1977 年 12 月 9~11 日于佛罗伦萨举行的葛兰西学术研讨会上，比亚焦·戴·乔万尼提出了“葛兰西著述中的组织危机与国家”问题。^①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自由主义国家的危机，克罗齐对此的回答是重新提出了精英民主制度，这与葛兰西提出的建立群众性民主制度的目标是截然不同的。群众性民主制度不能抛开国家，因此在戴·乔万尼看来，葛兰西是主张扩大国家权限的，国家的权限可涉及群众的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并负责市民生活的某些方面与部门。因此，为了渗入到群众的意识当中，国家就应该首先把他们社会生活中的经济一行会关系联系起来，巩固下去，使经济发展到一种新的生产力水平，并引入对国家职能普遍性的更直接的信任与信赖因素。这样，在自由主义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那种国家与经济之间的脱节状况便可被打破。

戴·乔万尼这里论及的是葛兰西在 1934 年对“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所做的思考，葛兰西在这一思考中曾预计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将会出现变革，国家通过组织储蓄与非生产性消费将引起“生产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变化”，并将成为“集体需求的潜在组织者”。

在 1977 年 12 月佛罗伦萨葛兰西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诸多报告中，没有人提及美苏之间已经为时 20 年之久的冷战所笼罩的国

见意大利联合出版社 1977 年出版的（葛兰西著述中的政治与历史）一书，第 229~230 页。

际形势，也没有人提及苏联的国内形势以及东方的人民民主制的悲剧性经验。但是在讨论中，翁贝尔托·切罗尼在其报告中发表了一种见解，这一见解证实了狱中葛兰西的真实思想与意大利共产党的政策之间存在的距离：

人们经常不是没有道理地提出，意大利共产党的一系列政治立场是很难真正地、原原本本地溯到葛兰西的政治思想的。工人运动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政治力量的多元主义、新国家的概念，以及意共自身的许多方面都是这种情况。在意共当今的政治立场与葛兰西的具体政治指示之间寻找同一性或者是寻找某种一致点，我认为这是徒劳的，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毫无重要意义的。^①

我不知道切罗尼的这一见解是否引起人们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但我认为，1970~1989 年的这 20 年间在意大利所发表的最有意义的研究都是出于以下三种考虑，即指导意大利共产党的政策、捍卫国家职能、不否定葛兰西与陶里亚蒂之间的理论学说方面的联系。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意大利共产党消失之后，难道不应以一种更遵从历史发展线索的方式来研究狱中葛兰西的政治思想吗？如果说存在着一位“陶里亚蒂的葛兰西”和一位“陶里亚蒂之后的葛兰西”的话，难道不应发现一位“陶里亚蒂之前的葛兰西”吗？如果按时间顺序来分析，难道不应把 1917~1927 这 10 年同 1927~1937 这 10 年明确地区分开来吗？葛兰西札记中的思考是在监狱中完成的，他的观察站就是一间单人牢房，在这里他过着“政治犯”的生活。他是作为囚徒在读书和思考未来政治解

翁贝尔托·切罗尼：《葛兰西著述中的政治与历史》，第 127 页。

决方案的，他也是作为囚徒在反复思索外来的消息的。他当时是以什么心情在观察意大利和欧洲的各种事件呢？

作为一位被严加监视的在押犯，葛兰西对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对墨索里尼的凯撒主义和希特勒的专制、对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一直在进行着观察和判断。作为被关押在意大利国家的一所监狱中的犯人，葛兰西的头号敌人是罗马的强制性政府。但是，责任是仅仅在于墨索里尼呢，还是也在于 1922 年作出了妥协让步的克罗齐当时所采取的那种反对立场呢？应该以轻蔑的态度继续谴责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像他一样被关入监狱——呢，还是应该提出一种和解的政策以便首先打倒法西斯主义呢？针对谈论所谓法制国家的法西斯法学家，设想建立一种带有一个以民意为基础的政府的市民社会，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葛兰西是采用压制手段的墨索里尼政党专政国家的受害者，但是在莫斯科难道不也存在一个带有“霸权式的政府机构”的国家吗？

1930 年 6 月，葛兰西被监禁在图里，他当时从哥哥杰那罗那里得知，彼耶特罗·特雷索、保罗·拉瓦佐利、阿尔方索·莱奥内蒂三人^①已一起被开除出党。其中拉瓦佐利在意共 1926 年里昂全国代表大会上与葛兰西一起被任命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莱奥内蒂则同葛兰西一起领导过《新秩序》报，一起冒过被开除出意大利社会党的风险，而且葛兰西一直保持与他的联系，一直在相互进行着讨论。葛兰西懂得，这个“三人团”的被开除出党，主要不是由于意大利共产党内表现出的意见分歧，而是由于莫斯科政治路线的国际背景。在同哥哥见面后，葛兰西陷入沮丧的情绪之中，并在给他的大姨子塔齐娅娜的信中写道：“我刚刚

^① 特雷索、拉瓦佐利、莱奥内蒂 3 人当时均为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1930 年，因与陶里亚蒂的政治路线有分歧而被开除出党。——译注

同我的哥哥会了面，而这使我的思想摇摆不定。”^① 在孤独当中，他竭力想弄明白这种思想冲突的深刻原因，并力求在托洛茨基被逐出俄国（1929 年）之后评估托洛茨基立场的理由。正是这时，葛兰西开始撰写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札记初稿，并对民族复兴运动的起源产生兴趣。

葛兰西当时是仅仅在思考反法西斯战略呢，还是由于不同意共产国际的路线，不同意党的宗派主义做法而在重新看待自己的理论主张呢？莱奥内蒂 1932 年曾经用法文写了一篇关于葛兰西在法西斯监狱内如何受虐待的文章，他 1957 年在巴黎曾向我本人私下讲到，在他看来，葛兰西一直把他看做是一位老同志和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另一方面，葛兰西后来在狱中中断了与同志们的交谈，而自我封闭在痛苦的沉默中。这是什么原因呢？

1930 年之后，葛兰西还真的是一名遵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的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吗？自 1930 年起，有关苏联进行审判、在西伯利亚建立劳动营、实行党内清洗的消息越来越频繁。真的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由于葛兰西从理论与实践上拒绝了政治多元主义和社会冲突，他所提出的社会模式便表现出强烈的有机论的色彩了吗？

1975 年之后，《狱中札记》的版本仍然是按照专题的准则出版的，没有特别注重按照时间顺序对不同手稿进行编辑。因此，贾尼·弗朗乔尼在题为（葛兰西的手工作坊）一文（1984 年）中提出的“关于狱中札记的结构假设”值得特别的注意。在《关于葛兰西的三篇论文》一书（1990 年）中，弗朗乔尼对原有假设再次作出确认。他很恰当地提到，葛兰西从开始撰写札记起，就一直按照时间顺序来为札记本编号，在撰写札记过程中，所加评

葛兰西：《狱中来信》，A 桑杜奇主编，第 339 页，塞莱里奥出版社 1996 年巴勒莫版。

注并不是按照一贯的规则添加的。而且，葛兰西经常同时在几个札记本上写作，有时他还会在已经编制好的札记本上添加新的注释。如果人们真的想要跟随葛兰西思考的时间线索进行研究，弗朗乔尼的这些看法是十分有益的。实际上，葛兰西的思考就是为了“对 10 月革命和法西斯主义胜利后工人运动面临的众多问题作出回答”。

1930 年，葛兰西在《政党与社会强制》一书中读到罗伯特·米歇尔斯论及墨索里尼——一个大党的惟一领袖——的论文，随后他写道：

与此同时，党内团体的组建和任何大会讨论都是被禁止的，因为这些都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墨索里尼利用国家来维持对党的统治，而在困难的时刻，又部分地利用党来统治国家。另外，米歇尔斯所谓的“超人魅力”，在现代世界总是与群众性政党的某一初期阶段相适应的，在这种阶段，党的学说主张在群众看来是某种模糊的、不连贯的东西，它需要某个永无错误的教皇式人物对它进行阐述，使之适应形势。

（《狱中札记》第 2 册 第 75 段，第 233 页）

葛兰西批判了墨索里尼及其党与国家间的关系，也批判了米歇尔斯提出的寡头制政党理论，但他同时也不安地注视着苏联的事件，担心斯大林这位布尔什维克党的惟一领袖的超人专制主义。被囚禁在法西斯国家牢房内的葛兰西，不能不反对各种“国家政府”内的国家至上主义形式和“官僚机构”的消极后果。他考虑对知识分子进行研究，但他在 1931 年给塔齐娅娜的一封信中明确地说道：

这一研究也导致对国家概念的某种界定，国家通常被理

解为政治社会（或专政，或强制性机关，其目的是为了使人民群众适应某一特定时期的生产形态和经济制度）而不是被理解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平衡，而知识分子恰恰是在市民社会中从事活动的。

1925 年，葛兰西在意大利共产党党校的第一份教材中曾公开说，他抄用、甚至是翻译了布哈林同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著作。但到 1931 年，葛兰西却批评了布哈林，因为他是“官僚主义的正统性的维护者”。葛兰西当时指出：“正统性不应该到马克思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弟子那里去寻找，也不应该到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那些流派的不同倾向中去寻找，相反它却是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完美无缺，包含着不仅可以构建整个世界观和整个哲学，而且也可以赋予社会的整个实际组织以活力的所有根本性要素。”（《狱中札记》第 4 册，第 14 段，第 435 页）

《狱中札记》评注本的主编瓦伦蒂诺·杰拉塔纳强调指出，葛兰西曾清晰地记得布哈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大众手册》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两部著述的法文版；另外，《大众手册》的附录部分是《上层建设与意识形态》。葛兰西上述深思熟虑的一番话语及对布哈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批评性看法”，难道不是从对党与国家间的关系的思路中、从对“国家与国家官僚机构”之间的相互混淆的担心中产生的吗？

葛兰西研究了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理论，并很有兴趣地阅读了卡尔洛·阿尔贝尔托·比基尼的小册子《限制国家活动的基本原理》（1921 年出版），因为这是“政治学说的最重要讨论”（《狱中札记》第 3 册，第 142 段，第 399 页）。但葛兰西同时也注视着斯大林主义的苏维埃国家，考虑着“政党与阶级及国家的关系”。葛兰西关于建立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新君主”的思想正

是从这一理论问题中起源的，他把这种“新君主”想象成为某一特定的历史性政党，这一政党，在明确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并在与各种社会力量进行独特的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特色鲜明的特定传统。（《狱中札记》第4册，第10段，第432页）

（《狱中札记》第4册第10～15段（1930～1932年）列出了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内容，尽管各标题之间似乎是毫不相干的：马克思和马基雅维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人民评论》（布哈林的著作）的注释与批评性思考、“正统性”的概念、克罗齐与马克思。葛兰西沉思默想的结果应该到《狱中札记》第5册第127段（论马基雅维利）中去寻找：

如果要把“君主”的概念翻译成现代政治语言，“君主”就应该是……一个想要征服一个国家或创建一个新型国家的政治首领；在这种意义上，“君主”就应该用现代语言翻译成“政党”。……它具有“实际的权力”，发挥领导的，因此是平衡不同利益的职能（……）。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现实之上，不可能建立一种传统式的宪法，而只能建立一种把自己的终结、自己的消亡、即把政治社会溶入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目的的原则制度。（《狱中札记》第5册，第127段，第661～662页）

在关于把政治社会溶入市民社会和关于国家消亡的这一革新性主题的背后，难道没有葛兰西曾经阅读过的、由 G. 萨纳教授译成意大利文的列宁的那本《国家与革命》的著作的影子吗？

列宁曾要求“消除国家，即清除对人实施的任何暴力”，因此，他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中一再谈到“共产主义的发展与国家消亡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国家不复存在时，才可以说有了自由”；“没有这种被称之为国家的社会强制机关，人们就会习

惯于遵守社会中的基本生活准则。”在第一阶段“国家不再是一种政治国家”，但向着更高阶段，或者说向着真正的民主的过渡，只有随着国家完全消失才会实现。在列宁看来，总是存在着机会主义力图回避国家问题的可能性，但这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当葛兰西谈论国家的“强制”和向市民社会过渡时，列宁所阐述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又重新出现在他那里。既然关于布哈林的思考涉及到市民社会，因此葛兰西就不可能把领导权（egemonia）的概念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的国家组织相混淆。葛兰西从 1930 年起就隐约看到了出现政党国家的危险，这种国家在意大利自称为伦理国家，在苏联则自称为无产阶级国家。另外还不应忘记的是，葛兰西从 1930 年底开始的对布哈林的批评后来一直在继续，而且似乎是针对一个象征性人物。有些知情者说，布哈林曾支持斯大林开展打击布尔什维克卫士的斗争，后来他虽然的确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在表示悔悟之后，他又于 1934 年被任命为《真理报》的社长。

葛兰西眼中注视着列宁的形象，但心里一直牢记着马克思的思想。葛兰西的研究者们没有记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版中不仅谈到“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而且还谈到“由市民社会和人民群众重新夺回国家权力”。这些概念在列宁对巴黎公社进行的积极评价中均被接受了。

葛兰西没有把对布哈林的批评同对克罗齐哲学思想的思考分离开来。正如尼科拉·马泰乌齐自 1951 年起就提出的那样，分析葛兰西与克罗齐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葛兰西政治思想的演化是具有根本意义的。而进行这种分析不能离开时间顺序的线索。弗朗乔尼在他的（葛兰西的手工作坊）一书中专用一章的篇幅来研究了《狱中札记》第 10 册的结构。在这一册里，葛兰西把收集在第 4、第 7、第 8 册中的大部分笔记重新汇集到一起，以便撰

写《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的论文。葛兰西的意图是，通过与克罗齐这位他认为是当代欧洲思想的最伟大人物的严密对照来“确定与现代文化和哲学相适应的实践”。通观葛兰西 1932 年的整个哲学思考，弗朗乔尼认为，《狱中札记》第 10 册，即《克罗齐的哲学》，“完全可以被看做是葛兰西在写作《狱中札记》的中间阶段在理论上所达到的最深入之点”。实际上，恰恰是在第 10 册中，葛兰西使用了理解为“市民领导权”的“伦理—政治领导权”（*egemonia etico-politica*）的表达方式，并提出了令人惊讶的疑问：“意大利将来与苏联的关系将会同康德—黑格尔的德国与罗伯斯庇尔—拿破仑的法国的那种关系相同吗？”（《狱中札记》第 10 册，《导言》第 1209 页）

（《狱中札记》第 11 册（1932~1933 年）包括（为撰写哲学和文化史研究导言和开始此研究而写的笔记）（第 1375 页），在这些笔记之前，葛兰西写了说明，指出在此册中所包含的评判性笔记“将需要全面地、仔细地重新阅读和检查”，因为它们可能“应该从根本上加以修改（第 1365 页）。在 1375~1395 页的《初步参考点》中，有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论断：“不能把哲学同哲学史、文化和文化史分割开来”（第 1376 页）；“哲学的最大弱点之一一般在于不善于创造下层与上层、普通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第 1381 页）；对知识分子与普通人民之间、高级哲学与一般常识之间关系感兴趣的实践哲学“不能不表现为对以前思维模式的超越”（第 1389 页）。在这些论断之后，紧接着的是对布哈林的“批评性笔记”，葛兰西在其中指出，布哈林通过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大众手册》一书并“未成功地确立作为历史方法论的实践哲学的概念”，也就是说没有成功地“从实际辩证法的角度解决克罗齐提出的问题，而是力图从投机的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第 1402 页）

随后，葛兰西批驳了主张超人领袖理论的米歇尔斯的社会

学，表示相信，随着群众性政党的扩展和这些政党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参与，领袖们对各种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将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理性与知识，而是通过群众的积极的、有意识的共同参与而逐步形成的（第 1430 页）。但是紧接着，葛兰西又重新提到“正统性观念，”并断言，实践的哲学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人道主义。”（第 1437 页）

从克罗齐与马克思的联系，葛兰西阐发了他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葛兰西清楚地了解马基雅维利的国家观与博丹的国家观之间的区别。他在《狱中札记》第 8 册（1931~1932 年）中写道：

博丹被归类于“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之列，但这显然是其历史意义的一个外在的、浮浅的特点。博丹是在法国这块土地上创建政治科学的。而法国这块土地向博丹提供的东西要比意大利向马基雅维利提供的东西先进得多。对于博丹来说，需要做的不是创建一个地域上的或者是统一的（民族的）国家，而是使这个已经十分强大并已立德脚跟的国家的内部彼此进行争斗的那些社会力量实现平衡。使博丹感兴趣的不是力量的因素而是同意的因素。（《狱中札记》第 8 册，第 114 段，第 1008 页）

这种看法，在《狱中札记》第 13 册（1932~1934 年）中的《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中几乎得到一字不差的复述，除此之外，葛兰西还补充指出，“应当把法的概念从超验和绝对观念的任何残余中解放出来”，“国家应该被看做是教育者，因为它的目

博丹·让（Bodin, Jean, 1530~1596），法国政治思想家，著有《国家论六卷》、《理解历史的捷径》等书。——译注

的是要创造一种新式的文明或新水准的文明。”换言之，“法是国家所从事的一切文明化积极活动中的约束性的、消极的方面。”（《狱中札记》第 13 册，第 11 段，第 1570~1571 页）

按照这种含义来理解“现代君主”问题，人们便知道，葛兰西所提出的不是作为权威的国家的问题，而是作为“现代君主”的“政党”的问题。从这种考虑又引出有关克罗齐的思考。克罗齐代表着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反对立场，但是他排除了政党的存在；然而，既然排除了政党的存在，他也就排除了“任何预先商定的行动计划，因而也就排除了任何为一场阵地战而准备的军事计划”。在葛兰西看来，在西方，必须更多从“市民社会”而不是从“国家”开始采取行动。

任何在牢房中受到屈辱的政治犯都不可能在理论上把一种强制性结构说成是“国家和警察的干预”。因此，葛兰西任何有关“扩大国家职能”的言论都不能同“加强国家”的说法混为一谈。作为“现代君主”的政党，首先应该是“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倡导者”，应该考虑集体的、民族的、人民的愿望，而不应成为一种由官僚组成的结构；市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活动”的。一个非资产阶级的政党可以把国家和法的消亡作为自己的目标，可以让国家和法在“完成了自身的任务之后”“被市民社会所吸收”。（《狱中札记》第 8 册，第 2 段，第 937 页）

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葛兰西认为，应该组建人民阵线，以便召开立宪大会。但是，立宪大会能否起草一部建立在广泛的人民一致之上的民主宪法呢？由市民社会一项清晰明确的政策所推动的复杂上层建筑的这种发展，能否导致一个非过渡性的、而是长期的民主时期呢？1931 年 4 月共和党—社会党联盟在西班牙取得的胜利对葛兰西的思想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当时，人们不是在谈论建立一个由男女公民普选产生的立宪大会吗？